

从个人视角记录一个立体的孙犁

——读《荷花的光影》

■ 毕亮

早些年痴迷孙犁的文字,整日流连其中,11卷《孙犁全集》翻过好几回。尤其是先生的书信,更是常看。第一次看到他和当时还是学生的段华之间的通信,对段华真是羡慕不已,同时大有余生也晚之叹。近几年,仍时常看段华的一些关于孙犁的文章,但段华到底写了多少有关孙犁的文章,我无从统计。当我读到他新出版的《荷花的光影——孙犁之旅》时,发现我之前看到的文章,在此书中的比重还不足三分之一。

之所以以《荷花的光影》为书名,段华是想“以荷花暗喻孙犁先生,本书的文字记录了他的片光只影;读者阅读时,如同旅行在孙犁先生的故事里”。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这是作者以孙犁为主题的文章的结集(并不是全部)。这些文章的写作跨度,超过了30年,真可谓一本向孙犁致敬的书。

此书的出版,距段华第一次读到孙犁的文章,已经过去快40年了。当时,不满十岁的段华被孙犁的《荷花淀》所打动,自此开始

了孙犁“粉丝”的生涯。因为《荷花淀》,段华千方百计地寻找收有这篇小说的《白洋淀纪事》,几年后才在淮阳县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当晚,段华“就是搂着这本书睡觉”的。

1982年,时年13岁的段华在报纸上看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孙犁文集》的消息,用省吃俭用的钱邮购了一套。有一天,段华看到了孙犁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青春余梦》,用一个中午的时间抄下了这篇文章,并写下了阅读心得《树与人》,投稿到《中学生阅读》,很快就发表了。这也是作者关于孙犁最早的一篇文章。

在距离第一次阅读孙犁近十年后的1985年,段华在父母支持下赴京津旅游,以便去见孙犁。7月5日,他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慕名许久的孙犁,从此开始了他与孙犁的忘年交情缘……

因为喜欢孙犁的文章,段华还做了不少田野调查,访问孙犁笔下的在世人物,实地察看孙犁写到的一些地方,用笔和相机记



录下调查到的情况……这些,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被段华记在了文章中,也都收进了这本《荷花的光影》里。此书分为四辑,从四个方面记录了作者心中的孙犁:第一辑记录的多是作者和孙犁的交往,有细节、有史料;第二辑谈到的,主要是孙犁作品的版本变化及传播;第三辑主要收录孙犁致

段华的书信,这些书信,让我们得以更近地走近孙犁;第四辑多为作者阅读孙犁的研究文章,观点鲜明、见识独特。

孙犁对段华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读书、写作、生活……还常送书给段华。一次段华去看望孙犁,孙犁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三册捆扎在一起的书送给段华。这三本书有贾平凹的,还有汪曾祺的,并有“值得读”的评价。孙犁、汪曾祺一直是互相欣赏;孙犁对贾平凹也一直寄予厚望;段华记录的细节,对于研究孙犁和汪曾祺、孙犁和贾平凹的关系,也都是值得关注的。

现在的读者、研究者谈到孙犁首创的“书衣文”,分析他的《书衣文录》,多把它们当作一种日记,来论述孙犁的思想轨迹和生活状态。段华在注意到这些之外,认为“‘书衣文录’不仅为孙犁晚年创作打下了文字的基础,也是孙犁书法艺术从一般到成熟,形成孙犁自己特色的一个过渡地带和时段”。

1975年,在孙犁晚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在孙犁的研究中,对此关注得也还不算多。但段华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年对于孙犁的特殊性以及研究孙犁的意义。《笼子里的挣扎——1975年的孙犁》一文就是段华试图对“处于内忧外患、无可奈何,甚至有时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的孙犁,所作分析的成果。这篇文章篇幅近万字,在段华有关孙犁的文章中十分少见。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孙犁晚年的一场论战》一文,在文章中,段华比较公允地记叙了这场笔战的经过以及后续影响。

《荷花的光影》是段华以一个晚辈、读者的身份,从个人视角记录的一个立体的孙犁,许多记录细微、真实、生动,许多史料和书中配图照片都是孙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颇为翔实;毕竟,有些资料消失也就消失了,不会再有了,也因此,此书便更显可贵。

即便孙犁对段华的影响再大,但在段华心中,“我从不敢说我是他的学生,连私淑弟子都不敢说”。在段华看来,他和孙犁的关系就是作者和读者、作家和崇拜者、老人和年轻人的关系。在我看来,正因为段华对自己如此定位,《荷花的光影》的价值更值得注意。

段华阅读孙犁的作品已经超过了40年,读着孙犁老去,是他的生活状态。

(上接第一版)

新时期以后,孙犁尽量推掉社会活动,集中精力写作。无论什么样的人到天津,他都很少去宾馆看望。但在1981年11月下旬,吕正操将军到天津出差,在石坚的陪同下,孙犁就到宾馆看望了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区,黄敬任党委书记,程子华任政委,吕正操任司令员,带领冀中800万军民,与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战斗,创造了地道战等著名战法。孙犁写了《第一个洞》《藏》等小说,这是最早以文学形式表现地道战的作品。1941年5月,冀中区组织声势浩大的“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从冀西山地回到冀中的孙犁,参加了第二辑的编辑工作,并写了《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孙犁还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在冀中区油印出版。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对冀中进行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吕正操、黄敬他们在紧张的战斗中,扔掉了很多东西,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于1943年在太行山区由华北书店印行一次,书名改作《怎样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多次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印行,书名改作《文艺学习》。1944年夏季,孙犁从晋察冀赴延安,途经晋绥区,已经在此任司令员的吕正操专门派人通知孙犁到他的司令部谈文学。一位闻名的武将,与一位闻名的文人谈文学,似乎让人费解,但明白个中背景,也就不再觉得奇怪了。

石坚告诉我说,他们到迎宾馆一见面,吕正操就问孙犁:“老孙,怎么样?”

“吕司令员”,孙犁还按照老习惯称呼吕正操,“建国后,进天津以来,我一直在天津日报社工作,我已经经历五朝元老了。”孙犁先生伸出右手的五个手指诙谐地说:“他是元老之一”,孙犁又指着石坚说。将军和孙犁、石坚都哈哈大笑。

将军说,看了孙犁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系列文章,特别是“芸斋杂谈”、“小说杂谈”,篇篇短小精悍,道理却说得明白,观



本文作者与孙犁先生合影,摄于一九九四年。

点鲜明犀利,写得大胆有力。吕正操说孙犁可以去文艺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他行。”孙犁一边摆手一边赶快否认,同时指了一下石坚。一向谦虚的孙犁又补充说:“司令员,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有点毛病,写不了长的,只能写点短小的,好在还保持着解放区的好传统,不停步,有股冲锋劲。”

将军问起了天津文艺界的情况,孙犁都一一作答。他们谈了一晚上,如果不是吕正操翌日一早要离开天津,看样子还要谈下去。临走,孙犁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重印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送给将军,里面真实记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将军接到孙犁赠书,很小心地收起来,因为那里面有他戎马一生的片段记录。

孙犁:文学就是写心里的感情

从1985年我第一次见到孙犁先生,到2002年7月7日夜我最后一次见他(4

天后他就去世了),多年忘年交,我基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冷漠和不近人情。只是,有的时候他倾听多一些,有时候说得多一些。

1985年7月,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虽然他觉得我年龄很小,但他仅坐在破旧藤椅上和我谈话就有二十多分钟。中间他起身给我找书、题字等等,嘴里也没闲着,漫谈文学与人生。我带了录音机,全程录了将近一盘磁带(正反两面)。他和我谈到了《散淡的人》。这个中篇小说的作者是谌容。时下的青年肯定更了解谌容的孩子,他们分别叫梁左、梁天和梁爽。

“段华啊,我最近读了一个好小说,《散淡的人》,对吧?是叫《散淡的人》,谌容写的。你读过了吧?”孙犁先生声音洪亮地问我。

赶巧了,《散淡的人》发表在那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我恰好刚看完,于是就回答说刚看过,“是写《人到中年》那个谌容吧?”我加了一句。

“对对对”,孙犁说;“她还写了《太子村的秘密》《真真假假》《错错错》,《散淡的人》写得也好,真名士有真东西。”

孙犁这么关注谌容的作品,我没有想到;我老实回答,没看过《真真假假》《错错错》。

“段华啊,(把这些作品)找来看看”,孙犁接着说,“你年龄还小,要多读书,多背诵,多看看。从小要养成良好的心境,要有童心,赤子之心。要想当作家,想要在文学上有点点滴滴成绩,不抱着赤诚的心是不行的。陆文婷(《人到中年》主人公——作者注),她对工作是有赤诚心的,作者没有赤诚心,感情不和她相通,就写不出来陆文婷这个人物。当然,你不一定也要过她那样的苦难生活。”

我基本听明白了孙犁先生的意思,他说的那个她,我的理解,既是指谌容,也是指陆文婷——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都有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

“心内要有思考,要有感情”,孙犁说,“你心内没感情,就没有高兴、激动、痛苦、沉重。文学就是写心里的感情,写郁结,写

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既有理想,也有现实;既有欢笑,也有血泪。读者也会跟着你,感情起伏动荡。当然,你生活里不要有血泪。”

话锋一转,孙犁又说:“《散淡的人》,我读了三个晚上,我本来读书就慢。慢慢读,慢慢体味,享受着阅读的快乐。你看杨子丰(《散淡的人》主人公——作者注),这个人机灵,说话机敏,你说他是悲剧人物,不是;你说他是喜剧人物,也不是,他就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人,散淡的人。但他机灵,说话有点哲学意味,其实这就是作者的哲学意味。谌容的意味。我读了三天,琢磨杨子丰的人生哲学嘛意思:其实就是看到了作者的哲学。读完了,我还是思考好久。”

孙犁集中谈谌容这篇小说——一个作家一部不起眼的作品,确实比较少见,但这正是孙犁先生眼光独到的地方。我把录音整理出来,多次研读整理稿。前些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孙犁先生的专题片,导演马勇找我,要借用录音带。找出录音带,我又听了一遍,心里说不出什么味道——那时,孙犁先生已经去世好几年。现在,再翻读整理稿,听他的录音,我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激动,但却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与生命同在的感动。那时候我年轻,他能经常和我谈人生、谈文学,我是多么幸运。

当然,说孙犁先生很健谈,也似乎有点绝对。他确实有不健谈、不说话的时候。我说一件事:

孙犁、梁斌、王林,号称“冀中三杰”,他们皆从抗战时期的冀中起步,并最终在文坛各有成就。孙犁作品勿论,梁斌《红旗谱》、王林《十八匹战马》,都可写进文学史。他们在冀中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本来是无话不谈。1975年春天,被扫地出门的孙犁先生从佟楼搬到多伦道寓所,梁斌、王林结伴去看他。劫后相逢,应该要说的话很多。但是,孙犁靠里面朝外坐,梁斌和王林在进门右侧面朝里坐;三个人坐在屋子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望着他,谁都不说话。坐了一上午,梁斌、王林站起来,默默离开了……